

“新新相引而日进”

——论梁启超运用“新名名词”建构国家观念

周 光庆（中国 华中师范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对于梁启超感应时代需要、运用“新名词”在“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的传统中国建构起国家观念的史实进行了专题研究。全文由三大部分组成：一，“特殊性的时代背景”，即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语言背景；二，“创造性的建构方法”，即“以解释新名词的方法进行会通而实现建构”、“以辨析新名词的方法进行会通而实现建构”、“以按语连贯新名词进行会通而实现建构”和“系联多家理论、融通名词术语进行会通而实现建构”；三，“系统性的国家观念”，即“以关键词‘国家’为核心的国家论”、“以关键词‘政体’为核心的政体论”、“以关键词‘权力’为核心的权力论”、“以关键词‘国民’为核心的国民论”和“以关键词‘变革’为核心的变革论”。

梁启超认定：“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事实，理论者，事实之母也”；¹并且相信：“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因此，他总在自觉而热情地引进新理论、建构新观念，用以开民智、变成法、改造社会、变革国家。他于1903年前后，在两千年来“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的传统中国建构起国家观念，就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范例。在此实践中，他又深切地认识到：“社会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国人如果仍然抱残守缺而抵制新名词，“必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此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而思想之传扬所以独迟也”（《新民说·论进步》）。所以，他在建构新理论尤其是国家观念的过程中，总是特别重视“新名词”，巧妙运用“新名词”，努力创造“新名词”，因而格外富于开创性和传播力。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未见有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有鉴于此，不揣试陋，本人愿意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1 《新民主主义·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0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以下梁启超言论皆引自这一版本的《饮冰室合集》，因而只随文注明篇章，不再另作详注。

一、特殊性的时代背景

一个多世纪以前，梁启超就能怀着文化精英的良知感应变革中国的需要，率先借鉴新理论、运用“新名词”，创造性地建构起国家观念，形成历史性的影响，自有其特殊性的时代背景。只有全面了解其时代背景的特殊性，才能真正认识他的这项大事业在今天已经有些模糊的本真面目和在今天仍然具有的思想意义。而要如此，最好能从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语言背景三个方面入手，以期实现完整而深入的了解。

第一， 社会背景。早在1900年“庚子事变”时，梁启超就痛感“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因而奋起探寻中国积弱之源，并于次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²他发现：“国家之强弱，一视其国民之志趣品格以为差；而志趣品格有所从出者一物焉，曰理想是已”。而中国国民之志趣品格“发源于理想之误者”有三：“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一言以蔽之，中国国民自古以来就未有实在而清晰的国家观念，最终造成了国家的落后与积弱。1904年，游历美国归来的梁启超又发表《新大陆游记节录》，更在与西方国家国民的对比中痛陈中国人的四大缺点：“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从根本上看，这四项“缺点”是相关联的：有第一项方有第二项，有第二项必有第三项，有第三项就有第四项，而“无国家思想”则是最为关键的。历史发展到近代，世界近代化进程已经启动，“欧人骤进，而我如旧，二千年所积进化之资格每下愈况”。所以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地球缩小，我中国与天下万国为比邻，数千年之统一俄变为并立矣。经济世界之竞争月异而岁不同，今者以中国为众射之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若是乎吾中国人之果无国家思想也，危乎痛哉”（《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我们认为，梁启超关于中国人历来“无国家思想”因而现在亟需建构新型“国家思想”的论断是敏锐的，是富有启示性的，它体现了一位杰出的读书人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文关怀。它所揭示的严峻现实，它所发出的历史要求，构成了梁启超建构国家观念的社会背景。与当时的中国不同，东邻日本则在近代化开始时兴起了一种国家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以反抗“现实的西洋”之压迫、摄取“理念的西洋”之文明而“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相号召，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与建设作用，成为明治精神的第一种精神。³这些无疑对梁启超奋起建构国家观念具有重要的促动作用和启示作用。

第二， 文化背景。梁启超之所以能够率先发现中国人历来“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致使中国只有专制政体而无立宪政体，主要是由于他的文化视野逐步扩大、理论眼光不断更新，能够自觉地以西方社会历史、国家思想及相关文明成果作为有力的参照。正如他自己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陈述的：“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承希

2 关于《中国积弱溯源论》写作与发表的时间，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判为1901年，今从之。以下梁代著述系年皆从李书，不再作注。

3 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蝗东学背景》第五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政治之团结，经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原大有所异。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更何况，梁启超深信：“亦有不必要自出新说，而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如法国之福禄特尔、日本之福泽谕吉、俄国之托尔斯泰诸贤是也”。为此，他决然“取前哲学说之密切于真理而适应于时势者，一一介绍之”，由此建构国家观念。所以，西方的政治文明，尤其是政治学大师孟德斯鸠、卢梭、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也就成为了梁启超在中国建构国家观念的特殊的文化背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早就有认为：“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亦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所以，他一贯主张借鉴日本学习西方而“因变致强”的历史经验，看重“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论学日本文之益》）的文化资源，特别推崇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的国家学说，大力挹取，融通转化。这也构成了梁启超在中国建构国家观念的特殊的文化背景。

第三，语言背景。在梁启超生活的时代，自强运动兴起，变法运动兴起，革命运动兴起。兴学校、起学会、译西书、进日书、办报刊、讲西学、开民智、新国民，成为时代的浪潮与亮色，一度出现了“家家议维新，人人谈西学”的动人局面。由于这种形势的促动和引领，在当时汉语的书面语乃至口语中，在当时人们的各种言语交际场合乃至皇帝诏书、大臣奏章里，都涌现出了一批批或来自欧美或来自日本、或流畅生动或深奥艰涩的“新名词”。这些奔涌而来的“新名词”，传载着新事物、新观念、新制度，开拓着中国人的文化视野，造就了新的叙事说理立论方式，促使汉语词汇系统发生了空前的变动。而所有这些，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趋向高潮的标志，正是近代社会变革趋于剧烈的反映。⁴乃至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大臣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感叹：“傥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1904年，又有人在《东方杂志》第十一期发表《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一文，以为：

自庚子以后，译事日兴，于是吾国青年各拾数种之新名词，以为营私文奸之具。虑事不周，率意轻举，逞其一时之兴会，弃信用而不顾。苟有责之，则曰冒险也。此可利用者一。学问寡陋，志趣卑污，不见齿于通人达士，不得已与二三无赖、四五流氓相征逐。苟有责之，则曰运动下等社会也，又曰人类平等也。此可利用者二。趁一时之风潮，慷慨激烈，不转瞬间颓然若丧，自居于冷血动物。苟有责之则曰手段和平也。此可利用者三……

无论作者的动机与观点如何，我们都要感谢他留下了如此生动的真实写照。由此可以

4 详见拙著《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第三章第二节，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

印证,在那个时代,学习和运用“新名词”以建言立论,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风气,已经显现新的思想效果,已是难以阻挡的潮流,这正是梁启超运用“新名词”建构国家观念的语言背景。

上述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组成了特殊性的时代背景,在召唤着、启迪着也烘托着天才梁启超,使他得以申其人文关怀,启其哲学学识,以创造性的方法,运用“新名词”在中国建构起国家观念。

二、创造性的建构方法

无论在思想建设的意义上还是在开启民众的意义上,梁启超在历来“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的传统中国,在许多人还抗拒新学理、抵制“新名词”的纷乱时代,率先运用“新名词”以建构国家观念,都是披荆斩棘的创举。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当时严复等文化精英誉为“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的巨大成功,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力于他创造性地运用“新名词”的种种方法。他运用的新方法,有受西方文化启迪的,有借鉴于日本学界的,更多地则是自己创造的,他都能因事制宜、相互补充。

第一,以解释新名词的方法进行会通而实现建构。

建构国家观念,首选必须界定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甲骨文中即有“国”字,“开国大业”、“亡国之恨”之类的话头更是广泛流传,中国人自以早就具有国家观念。但是,中国人本有的国家观念,是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国家观念,而非民主共和政体下的国家观念,更非与近代化相适应的国家观念,所以才亟需建构新的国家观念。其建构的方法,可以是大批判式的,可以是全移植式的,但却容易招来国人的反感而很难赢得国人的认同。所以梁启超运用的方式,是重新解释关键词以会通多种思想而实现观念的重构。他所解释的关键词看是原有的“旧名词”,实则变成了“新名词”。为此他特著《国文语原解》,其中有云:

《说文》“或”下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会意。一,地也。”今案:此造字最精之义也。……人在地上,以戈守之,此正国字之解释也。近世学者言国家之要素三:曰领土,曰人民,曰主权。“或”字之口,所以表人民;其一,所以表土地;其戈,所以表主权也。表主权而必以戈者,必以武力,乃能保国家之独立,且使人民生服从之关系。

梁启超对关键字“国”的重新解释,既引用了中国汉代文字学大师的成果而加以变通,又引用了西方近代政治学大家的见解而予以提炼,使二者相衔接,将后者融入前者,使前者装载后者,从而会通二者以形成了自己的新见解。其新见解,既以前者为基础,又以后者为依归,实则是会通二者以建构起来的国家观念的一部分。尽管从甲骨文“国”字的形体看,他所谓的“口”以表人民、“戈”以表主权并不确切,但却很能赢得国人的

5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第四册47页;《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12期。

认同，充分表现出了这种方法的奥妙。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国文语原解》中重新解释“法”、“制”、“则”、“政治”等关键词时，都运用了这种方法，获得了这样的效果。

第二，以辨析新名词的方法进行会通而实现建构。

在梁启超的时代，绝大多数“新名词”，是由中国学者或日本学者分别采用或重组汉语词意译西学对应的语词而形成的。就译者而言，在理解和表达意义上难免有些偏颇；就读者而言，在理解和运用意义时难免有些误差；在传播过程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现象也往往有之。这就需要及时的辨析订正。事实上，当时已有学者以各种方式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工作。梁启超也是如此。然而，梁氏对“新名词”的辨析订正与其他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往往是自觉地以会通各种思想为手段，以建构新思想为目的，并且获得了建构新思想的效果。最为典型的是《释革》一文。但为篇幅计，这里仅以其1901年在《清议报》上发表的《立宪法议》中辨析“民权”与“民主”的一段为例证。本来，“民权”与“民主”二词其实都是近代学者对于英语中 democracy 一词的意译。但是一经用这样的方式引进之后，当时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又从各自的文化视界出发，按照汉语复合词的结构规则来理解和使用，将“民权”视为“民众的权力”，将“民主”讲成“民众作主（民为主）”，加以严格的区分，或褒扬前者而排斥后者，或尊崇后者而包容前者，引发了久而激烈的争论，表现出了对立的政治立场。梁启超则认为：

吾侪之昌言民权，十年于兹矣。当道者忧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兽然。此无怪其然也。盖由不知民权与民主之别，而谓言民权者必与所戴之君主为仇，则其忧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两者同为民权，而所以驯致之途，亦有由焉……故采定政体，决心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而不容稍缓者也。

显然，梁启超通过辨析“民权与民主之别”，既是力图消除当道者的畏惧，又建构起了“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的国家观念，而且还论述了“采定政体，决心立宪”的“不容稍缓”性。他的这一作法，当时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次年，黄遵宪发表《致新民师函丈书》，对此予以应和：“今之二三当道……绝不知为国民、由国民之为何义，天赋人权之为何物，民约之为何语，谬以为唱民权必废君主，唱民权必改民主。”⁶

第三，以按语连贯新名词进行会通而实现建构。

为了在中国尽快地实现维新变法、采定政体、决心立宪的政治理想，梁启超总在努力“取前哲学说之密切于真理而适应于时势者，一一介绍之”。但是他的介绍有异于人，不仅作出了严格的选择，不仅作出了生动的讲解，也不仅仅是移植思想，而且常常在适当的地方加以按语，在按语中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下时势，提出各种问题，连贯各种“新名词”，会通各种思想，阐发出自己的新见解，并且组织“新名词”构拟各种应用方案。即使你并不认同他的政治见解，但也不能无视他的社会关怀。他对国家观念的建构，尤其如此。例如在《卢梭学案》中，他在讲解了“卢氏又以为联邦民主之制，其各邦相交之际，有最紧要者一事。惜哉，其所谓最紧要之一事，未及论叙而卢

6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03-3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氏遂卒，使后人有葭苍露白之感”以后，便紧承遗意，特撰按语：

案卢氏此论，可谓精义入神，盛水不漏。今虽未有行之者，然将来必遍于大地，无可疑也。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

按语中：“自治”一词采自卢氏理论，与其理论系统中其他相关词语相衔接；用于中国实际，将中国特定的实际状况融注其中。“团体”一词，同样采自卢氏理论，同样与其理论系统中其他相关词语相衔接；却又用于中国将来，却又将自己关于中国的改革设想融注其中。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进一步运用“新名词”提出了“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以在中国建立“联邦民主之制”的改革方案，开拓了当时变法志士的思路，充实了自己建构的国家观念，直到今天仍然有其价值。

第四，系联多家新理论，融通其名词术语，会通其思想精华，以建构国家观念。

梁启超热心介绍和阐发西方前哲的政治哲学理论，决非仅仅为了引进“新学”，决非是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他有其更为崇高的目标，那就是要使中国“采定政体，决心立宪”；他有其更为宏大的标准，那就是“密切于真理而适应于时势者”。为此，他常常在同一篇文章中，介绍和阐释了一家学说之后，立即指出其有所不足，于是又介绍和阐释另外几家与之相关联的学说，使之相互彰显、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并且贯通其发展脉络，融通其名词术语，会通其思想精华，然后用于中国实际，建构起新型的思想理论，设定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即使你并不认可他的政治见解，也能从中获得教益。名文《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就是一例。在本文的开头，梁启超明确申言：“卢梭学说于百年前政界变动最有力者也，而伯伦知理学说则卢梭学说之反对也。二者孰切真理？曰：卢氏之言，药也；伯氏之言，粟也……伯氏于国家起原论，取卢氏之立脚点而摧陷之者也”。因此，在阐释了卢氏的学说之后，他结合介绍了伯氏的学说。在本文的中间，梁启超又指出：“按伯氏所论共和政体之价值，可谓博深切明，然犹有未尽者，顷读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波伦哈克所著《国家论》，有足以相表里者，附译如下”。译介之后，梁启超又沉痛提示：“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读完本文，人们自然会相信，如其说它是在评介和借鉴伯伦知理的学说，不如说它是在研究并会通西方近代国家学说史。在这里，随时可以看到“民主政治”、“共和政体”、“国民自觉”、“国家主权”、“国家目的”、“国家有机体”、“独立之国体”等等大量的“新名词”。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不再只是卢氏、伯氏或波氏各自赋予的原意义，而是会通了三家学说之后而产生的新意义，而是梁氏所阐发、所提取的新意义。将这些“新名词”按照梁氏心目中的规则组织起来，则又能彰显出梁启超建构的国家观念的框架和特色，读者也会只觉其新颖而不觉其陌生。

三、系统性的国家观念

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家，梁启超的卓越之处主要在于，生当封建专制王朝，在文化精英大都醉心于“中体西用”的时代，他却能对全球国家体制历史演进的总趋势，有一种高层建筑式的观察和穿透雾般的见解。他敢于宣言：“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立宪法议》）。正是由于受此激励与启发，他才能坚定地运用新学理、“新名词”建构国家观念；他所建构的国家观念才能具有难能可贵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其国家观念的系统性，主要表现为：它有一个可视为总论的提法，那就是“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以此总论式的提法为基础，它又建立起以五个关键词为核心的五个分论，即“国家论”、“政体论”、“权力论”、“国民论”和“变革论”。总论提出问题、举起大纲，分论依次展开、相互呼应，显示出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第一，以关键词“国家”为核心的国家论。

在近代意义上，“国家”其实是一个“新名词”。梁启超对它至少进行了三种定义式的论述：其一是，“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家。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立宪法议》）；其二是，“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爱国论》）；其三是，“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此外，在阐述《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时，他又强调：“国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无以名之，名之曰有机体”。由此可见，正是以阐发新名词“国家”之新意义为核心，梁启超会通多种思想建构起新的“国家论”，要点有四：其一，“国家”既是对内而言的，也是对外而言的，它是由领土、人民、政府、主权四种要素组成的“有机体”；其二，在四要素中，人民是其主体要素，民权则是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和国家独立地位的关键；其三，在近代化进程中，政体至关重要，故而能以政体为标准区分开“君主之国”与“民主之国”；其四，组成国家的四种要素相互依存、共同作用，能凝成“意志”，能发出“行动”，所以国家才是一种“有机体”。而这四种理论要点，都是以关键词“国家”为核心而逐步展开的。

第二，以关键词“政体”为核心的政体论。

维新变法运动的最高目标，是以和平手段变革中国两千年来不变的政体，使中国走上近代的道路。所以梁启超特别重视对于政体的论析，这集中表现在《立宪法论》一文中。鉴于中国古人并无政体观念，古代汉语的“政体”一词仅指“为政的要领”，所以他首先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使之转化为“新名词”。以此为核心，他先是指出：“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

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讎，故其民极苦，而其君与大臣极危”。接着分析：“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最后又高瞻远瞩地揭示：“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细读之后不难看出，梁氏的政体论，是以组织“新名词”、解释“新名词”的方式逐步展现的，既借鉴了西方政治学说，又针对着中国社会现实；既是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又是作为实践中的方针。他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对世界政体走向的把握，都显露出了非凡的眼光。而他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则又用心良苦、错配药方。总体而言，其政体论对于其国家观念，是一种充实，一种导向。

第三，以关键词“权力”为核心的权力论。

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梁启超非常向往一种“民族主义”勾勒的境界：“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为了保证国际的“国之独立”和国内的“人之独立”，国家必须拥有并能行使充分的“权力”。对于“权力”，他有深刻的解释：“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国家思想变迁异国论》）。国家的“权力”必须是合法而又实在的：就国际而言，国家要有“主权”；就国内而言，国家须行“平权”。落实到国内的现实政治生活之中，“平权”的理想又应变通为“有限权”的法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有限权”是一个全新的“新名词”，因而梁氏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解释：“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政府）有官（政府）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立宪法议》）；“权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滥用其自由也。滥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谓野蛮之自由；无一人能滥用其自由，则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谓文明之自由”（《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于是，在立宪的政体内，在宪法的规定下，君权、官（政府）权与民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确保国家的安定、发展与进步。但又必须强调：“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非谓政府界民以权也”（《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政府）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也”（《立宪法议》）。更加不能忘记的是：“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

第四，以关键词“国民”为核心的国民论。

梁启超忧心于中国人只知做“臣民”而“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要知道，“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故而中国人往往只知忠于君而不知爱其国，缺乏独立人格、权力意识和自治能力。为此，他坚持不懈地呼吁中国人努力培育起国民意识，做堂堂正正的国民，并对这个全新的关键词“国民”作出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解释：“国民为法律上之一人格”，“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

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并且论证：“凡一国之有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独一种独立之精神”（《新民说·释新民主主义》）。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中国人要由传统的“部民”演进为当代的“国民”，就必须通过自我革新而成为“新民”。“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释新民主主义》）。“新民”就是中国型的当代“国民”，他必须具有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他必须具有利群公德和爱国公德，他必须具有权利思想和义务意识，他必须具有“自治自尊”和“冒险精神”。（《新民说》）这种理论具有很大的震撼力量，在中国是首创的，代表了中国政治思想进步的方向，因而被 20 世纪 30 年代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誉为“第三等级的人权宣言书”。

第五，以关键词“变革”为核心的变革论。

梁启超建构的国家观念：不仅具有理论的品格，而且具有实践的品格；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创新性，而且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而所有这些，都因其还有“变革论”而更加彰显。正是“变革论”，使其国家观念更为完整、更加精神、更是富有感召力，而其要旨，则是感召国人认救亡图存、实现近代化的最大需要，奋起变革中国几千年沉积下来的专制政体，开创中国面向光明未来的立宪政体。为此，他于 1902 年特撰《释革》一文，对关键词“变革”进行深入的辨析，从而注入全新的涵义，使之由古老的“旧名词”变为鲜活的“新名词”：“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 Revolution 之义也。”然后进而揭示：

今日之中国，必非补苴掇拾一二小节，模拟欧美日本现时所谓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经一度之大变革，举其前此最腐败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体固已完善矣，而因此精益求精、备益求备。我则何有焉，以云改革也？如废八股为策论，可谓改革矣，而策论与八股何择焉？更进焉，他日或废科举为学堂，益可谓改革矣，而学堂与科举又何择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云，改革云，更阅十年，更阅百年，亦若是则已耳。……吾故曰国民始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

就这样，以辨析“新名词”为方法，以关键词“变革”为核心，梁启超在将“变革”与“改革”的比较中建构起了自己的“变革论”。显然，他所呼吁的“变革”，与时人所高唱的“改革”有根本的不同，它是中国政体的根本性变革，是中国国民的根本性变革，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性变革，而实现这种根本性的“大变革”，正是其国家观念的最高目标和实际归宿。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启超感应时代的需要，引进“新名词”，创造“新名词”，辨析“新名词”，组织“新名词”，使“新名词”表达新学理，用“新名词”建构新观念，“新新相引，而日进焉”，终于在几千年来“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的传统中国，树立起国家观念。他所建构的国家观念，因其建设性地会通了各种思想而开拓了中国

人的文化视野，因其创造性地运用了“新名词”而使“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它是创新的，是系统的，是进步的，直到当今仍然有其巨大的启示作用。